

霧都重慶的崢嶸歲月

葉周



荒煙和以群，從「文協」舊址出來，又來到曾家岩周恩來的辦事處。荒煙回憶道：以群站在周恩來的辦公室裏，一隻手顫抖著輕輕撫摸著桌面，他似乎重又憶起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個長曠，一個個夜，他來這裡報到，他來這裡接受指示，他似乎想再一次對周恩來說：「我想去解放區去。想說：周恩來同志，我該怎麼辦，請指示！可是恍然間他又清醒地意識到：畢竟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的重慶了，他和周恩來之間相隔著千山萬水，他無法對總理說什麼。

臨離開時，以群戀戀地望著桌前的座鐘，好像在心裡說：「再見了，周恩來同志！」就如周恩來有過的那樣，他走出了曾家岩，到白圍去了，去從事艱險的地下鬥爭。可是這一回荒煙驚奇地發現，他眼眶裡積著淚水，閃動著淚光。

從周公館回來，以群和荒煙一起吃晚飯，可是飯桌上的話題總是圍繞著抗戰時期在重慶的許多往事，圍繞著周恩來對文協工作的關懷。以群喝了一點酒，臉色微紅，他說起了上海的一些情況：張春橋一夥在上海文藝界整風，在電影界整風，夏衍、陳荒煤（路綽），要批什麼「通天幹部」——指文藝、電影界能夠經常見到周總理反映上海情況的人；市委書記柯慶施有句名言：「他們究竟是聽黨的，聽我們市委的，還是聽誰的？」

以群突然地激動起來，敲著桌子提出一連串質問：「周總理難道不能代表黨？我們為什麼不能向他反映情況，不能聽他的話？一個黨員對市委領導人有些看法不同，就是不聽黨的話？我們……我、夏衍和你要反黨……」不易激動，溫和的以群此時慷慨激昂，聲色俱厲。

「以群，不要講了！」陳荒煤大聲地說。

於是，他們沉默不語地悶坐著，直到分手。重慶的深秋是濕冷難耐的，茫茫大霧籠罩了天空，纏繞著，直到在迷霧繚繞的路邊，以群和陳荒煤告別。這時的以群已經恢復了平靜，臉上又漾起了和往常一樣的溫和的微笑，他緊緊握著陳荒煤的手，不願鬆開，最後輕輕嘆了一口氣說：「你還是應該給總理寫封信！」

以群轉身走了，他邁著平穩、快捷的步伐徑直地走了。待到陳荒煤領悟著他最後的話，抬起頭來時，以群已經被滔天滾滾的霧浪吞沒了……

第二天清晨，周恩來還見了時人艾青，安排他去延安的行程。來溫泉開會的人員不少，吃飯時坐滿了五張大圓桌。參加座談會的，其中有梁漱溟。最後是周恩來講話，他用清楚、親切的話語，分析國際形勢及國內抗日戰爭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對抗戰前途的信心，令在座的知識分子大受鼓舞。周恩來一行乘車，沙汀、胡風陪周恩來在溫泉住下。二十六日上午，周恩來一行乘車，沙汀、胡風陪周恩來，到三十里外的草市街育才學校參觀。陶行親自率領學生夾道列隊歡迎。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發生後，項英犧牲，葉挺被俘的消息傳來，中央決定迎接更大的分裂。南方局貫徹「蔣嚴韓精，積蓄力量」的方針，周恩來、徐冰召集沙汀、以群等討論組織重慶大批進步文化人疏散。疏散的地點主要是延安、香港。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以群隨同茅盾去了香港……

重慶的戰鬥歲月是以群的記憶中是顛簸的，忙碌的，但又充滿了激情和責任，他受到周恩來副主席的充分信任，時時被委以重任。在重慶主持「文協」工作以後，周恩來又安排以群輔助茅盾編輯《文藝陣地》，並於一九四一年陪都茅盾夫婦去香港。後來，日軍佔領香港後，又陪都茅盾夫婦長途跋涉逃離香港，到東江軍隊隊所駐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為了避免國民黨的暗算，周恩來又安排以群陪同郭沫若撤離上海，去香港。以群到了香港，直接在中共地下戰線的領導人潘漢年領導下為安排大批各界愛國人士回內地，為迎接新中國建國送來，做了大量工作。在那段日子裡，在潘漢年的領導下送來四百多位著名人士中，經過以群安排的人士就有：郭沫若、茅盾、許廣平、周建人、馮雪峰、葉聖陶、鄭振鐸、胡風、王冶秋、余心清，還有陳毅早年的友人，作家金滿城等。

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天，以群盼望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一度因國民黨軍隊封鎖江西而停航的輪船又通航了。他提著輕便的行裝，匆匆辭別了幾度輾轉停留的香港，途經天津、北京。行前他替電影導演和演員們而己，顧也魯找到任處，交給他們一件任務。以群說：「我很快就要離開香港，並且我也希望很快在新中國的土地上見到你。在我走以前，一定請你們替我辦成一件事，請你們以我的名義向李麗華、孫景雲、陶金、歐陽沙菲發出邀請，歡迎他們回到新中國來。」

顧也魯和以群也魯望著面前這位熟悉的朋友，體味著他話中的分量。儘管這一天也依然猜測著他的身份，現在他們更確信他一點，他就是地下黨。他們答應了以群的要求，先後向四位在港的著名演員發出了邀請。結果孫景雲和陶金不久回到了上海，李麗華和歐陽沙菲，仍居留香港。以群離開香港不久，一夥國民黨特務衝進了顧也魯的住處，要他交出葉聖陶、趙樹理和歐陽子倩。所幸的是他們都已離開了香港，趙樹理的話，以群又將再度被捕入獄。

唐朝官員的綽號

姜少勇



綽號，又稱外號、諱名，往往是按照人的容貌氣質、性格特點和一貫做派所取的別名和戲稱。讀唐史，讀到一些官員的綽號，既形象地展現了他們的個性特徵，也反映出當時的社情民意，官風政聲。捧腹之餘，引人深思。

武則天的時候，官來得容易，腦袋也掉得容易。一些官員為了自保，怕擔風險，說話辦事就模稜兩可，生怕被抓住把柄。時任宰相的蘇味道，就是老奸巨猾之徒，處事圓滑，凡事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一次，他的門客問道：「天下醫生們開的藥方子有那麼多，藥物的搭配又那麼複雜，請問相公這其中調和配方的原理是什麼？」蘇味道佯裝糊塗，只是用手摸摸床的框樞，卻一語不發，於是人稱其為「模稜手」。其自述也頗有心得地說，「處事不欲決斷明白，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

當時有一個宰相叫王及善，才學平庸，行為猥瑣，精神遲鈍不清醒，完全靠父蔭起家。在文昌台（尚書省）任右相時，不去做國務政務大事，而是馬伏一般，只去監管令史們（未入流的低級事務官）騎的驢子，防止進入都省官署。每日吆五喝六，整天樂此不疲，成為朝野笑柄，於是就有了「驅驢宰相」的綽號。後人用「驅驢宰相」專門形容那些執事子弟出身、不學無術又不務正業的人。

封建時代的官吏，大多貪婪無恥。唐時密州刺史鄭仁凱，特別摳門小器。有一天，家奴的鞋子穿壞了，請求他再給自己買一雙。慳吝成性的鄭仁凱哪裡捨得自掏腰包？過了一會兒，他看見看門人腳上穿著一雙好鞋過來了，便靈機一動，吩咐看門人到庭院裡一棵大樹上去捉鳥。看門

人不明就裡，聽了鄭大人的話，就脫鞋上樹。鄭刺史立即安排奴僕把他的鞋拿走。此事傳開後，鄭大人便有了「偷鞋刺史」的雅號。

這還只是惡作劇似的卑鄙，更惡劣的是私慾得不到滿足，就藉機報復，把人家整得傾家蕩產。有一叫王弘義的，本是鄉間無賴，武則天稱帝後的天授年間，鼓動密黨，重用酷吏，王弘義就靠誣告他人起家。先被授游擊將軍，後又被任命為御史，與來俊臣一起專幹誣告士大夫的勾當。有一次，王弘義會在鄉間向瓜農要瓜吃，瓜主很鄙視他的為人，當然不肯給他。王弘義本是無恥之人，鬼點子也多，為了報復，回來後就向縣衙繪聲繪色地編造故事，說在瓜園裡看見有白兔。縣衙一聽，興致勃勃，立即集令人追捕，頃刻間瓜秧瓜果被糟蹋一地掃蕩一空，瓜農欲哭無淚。人們非常憤恨，稱王弘義為「白兔御史」。

唐朝已經開始科舉取士，一般來說，靠考試做官的人，筆墨之事當屬本分，但有時也不盡然。當時有個名叫陳希問的，曾擔任司刑司的官職。此人無才無能之輩，各種公務到了他的手上，不知如何處理，手頭積壓甚多。他辦公時一手執筆，一手支住額頭，半天都不知道如何下筆，同衙門的人戲稱其為「高下筆」。而且，凡是由陳希問經手的公文，刪改之處甚多，時間又拖得很長，以致紙張穿破，針刺一般，出現很多孔洞，所以又被稱為「按孔子」。還有一個中書舍人（即為皇帝起草制敕的官員）叫陽滔，一次，皇帝急令他抄製詔書，可是拿著庫房鑰匙的令史去了別處，取不出舊的稿本參考，無法依樣畫葫蘆，完不成任務就要丟官降俸挨板子。陽滔情急之下，也顧不得為官之尊，親自找來一把斧子，將窗框砍斷鑽了進去，

南北戰爭

馮進



那裡的「北方人」生活不夠精緻。南京素有六朝古都的美譽；長江鍾山，龍蟠虎踞；斜陽草樹，銅駝巷陌；江山如畫，文彩風流。它不但與蘇州同在一省，而且還是江蘇的省會，竟然也被看成粗陋的「北方」，讓人不知是否該感嘆某些南方人的地域偏見何等頑固。當然，這位朋友是「姑妄言之」，我們也是「姑妄聽之」，不一定能因此得出所有蘇州人都排外、歧視北方人的結論。然而，中國南北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的不同，確實有目共睹。兩種地域文化的反差甚至在歷史上的衝突也是有據可查的。到了美國之後，我才知道這裡的南北文化也迥然相異。

美國的南北方分界線叫做梅森—狄克森線（Mason-Dixon Line）。它是為了調停英國在美國的各個殖民地之間的領土權益之爭，由梅森（Charles Mason）和狄克森（Jeremiah Dixon）兩人在一七六三至一七六七年勘測之後劃定的。這條界線如今蜿蜒於美國的四個州之間：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馬里蘭（Maryland）、德拉威爾（Delaware）和西弗吉尼亞（West Virginia），也包括弗吉尼亞（Virginia）州的一部分，歷來是美國南北文化的分野。

以此劃分，我其實一直住在美國的北方，朋友中卻有在南方工作的美國北方人。聽他們說起「一個北方人在南方的生活」，覺得很有意思。比方說，南方人普遍比北方人待人更加親熱，對陌生人的稱謂不是一本正經的「先生」、「女士」，往往會有「蜜糖」（honey、sugar）一類的暱稱，讓我的朋友們覺得不太自在。南方人的生活節奏比北方慢，好像也更喜歡社交，時不時要搞點茶敘、酒會、燒烤之類。如果過分重視個人空間和時間，恐怕會被當地人視為自大傲慢、目中無人。所以有位朋友悲嘆說，為了當個「好同事」，自己都沒有時間做研究了。

不過也不要被美國南方人表面上的友好所迷惑。雖然美國北方人認為南方工業不發達，經濟不景氣，對南方人的偏見是「一群沒受過教育的鄉巴佬」，更有種種貶稱如「稻草籽」（hayseed）或「山居比利」（hillbilly）之類。但南方人卻自認為保持了歐洲的優雅文化和一個逝去時代的美好人情，而覺得北方人粗魯、野蠻，沒有文化。有些固執的美國南方人至今還把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the Civil War）稱為「北方侵略戰爭」（The War of Northern Aggression）。可見，南北差異不光是中國有，美國也有。因為我在美國南方只有過蜻蜓點水似的短期訪問，所以也無法判斷美國北方人互相之間的看法有多少事實根據，又有多少是出於歷史原因或地域偏見。反正我交朋友，是「地不分南北，人無論東西」的。倒是有個在華盛頓上學、工作的朋友曾經抱怨，說美國首都的「潑婦刁民」皆具北方人的缺點：北方人的臭脾氣加上南方人的慢節奏，真是不可救藥云云。

「三句半」記趣

王兆貴



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政海拾零》中，記述了上世紀中期毛澤東的一段軼事。當年，毛澤東經常參加中南海週末舞會。有一次，他和幾個歌舞團演員分別跳舞，其中有個小演員叫朱立剛，另一個小演員叫王君苗，是獨生女，深州人。

河北深州盛產水蜜桃，當年曾為皇室貢品。於是，毛澤東就以深州水蜜桃為名，隨口念出一首打油詩：深州水蜜桃／獨生一根苗／遇上朱（豬）八戒／吃了。毛澤東即興所念的這首打油詩，就是當年在眾聲喧嘩文藝舞臺上風行一時的「三句半」。這種曲藝形式表演者只須四人，道具也不過一套鑼鼓傢伙。上台來，先擊一通簡單的鑼鼓點子走圓場，到前排成一排後鑼鼓點驟停，亮相。然後



收穫希望

(攝影) 高鶴雲

，前三位表演者依次說出一句五至七言韻白，第四位表演者則用兩三個字的韻白收場。接着再敲起鑼鼓點走圓場，如此數個回合，表演方告結束。由於在每個回合的表演中，前三位各說一句，最後那位只說半句，所以稱作「三句半」。表演的諧謔效果，全在最後那一位表演者的韻白上，雖說只用兩三個字，卻須生動俏皮，滑稽好笑。由於這種曲藝形式簡便易行，饒有風趣，一時間頗為盛行。原以為「三句半」是現代人的發明創造，經查考得知，這種曲藝形式古已有之，不過那時不叫「三句半」，而叫「十七字詩」。

明武宗正德年間，有個人好作十七字詩，不論看到什麼都能出口成章。當時大旱，太守為民求雨無果，他就作詩嘲笑說：太守出椅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窗看／見月！太守知道了這件事，就讓人把他抓來，訓斥說：「你不是善於作十七字詩嗎？

現再試作一首，如果作得好就放了你。」太守別號「西坡」，那人就以「西坡」為題，隨即吟道：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較／差不多！太守聽後大怒，令人把他責打了十八大板。板子打完，那人又吟誦出一首來：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

太守聽了，哭笑不得，判他誹謗，發配到鄖陽，其娘舅來給他送行，兩人把持不住，都流下了眼淚。觸景生情，他又吟道：發配到鄖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

原來他娘舅是個獨眼龍。「十七字詩」屬於詼諧詩體，前三句莊重嚴肅，後一句雖然只有兩個字，但結構突兀，機鋒驟現，幽默詼諧，頗有「畫龍點睛」之妙，尤為普通老百姓所喜愛。後來，這種變體詩最終發展成一種順口溜式的民間曲藝形式，即人們通常所說的「三句半」。

南京歇後語溯源

谷萬中



明清時期，南京的絲綢業很發達，許多以絲織為業的「機戶」，瞄準商機，紛紛投資開設「機房」，僱用工人生產，一家機房，少則幾十台，幾十台織機，規模最大的機戶，擁有織機五百、六百台。聽聽人們回憶，那時整個南京織機，尤其城南，到處都是低矮平房，不適當安裝織機，只能在室內，挖地三尺，將織機的相當部分置於地平面以下才行。門西一帶由於地勢較高，得天獨厚成為機房聚集之地。機戶們長年累月於陰暗條件下進行操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又大，因此，關節炎、駝背等，成為機工們最常見的職業病。

生活艱辛自不必說，還要受僱主剝削和壓迫，勉強能夠維持清貧生活。工人們回到早黑地幹活，不，吃過飯，就趕快回到織機旁，稍有不慎，就免不了遭老闆白眼。

一則不乏幽默的老南京歇後語，正是這狀況的刻劃。同時流露出機工們對業主不斷滋生坐來的反抗心態：「鞭子下井」——撈上來還是坐（做）。現今，「打壞隻碗，算不了什麼，尤其小孩子時常為之，這時一旁的大人往往還會說聲「碎碎（歲歲）平安」，以此來緩解孩子的惶恐心理。若是放到平日，那可就不行了，只要有可能，人們總是將碎碗撿起，放好，待補碗匠來修補，沒法子，那時候窮啊。

當年南京最先換持補碗的，是來自安徽江西景德鎮的手藝人，他們肩挑一個擔子，每日走街串巷，大聲吆喝，生活很是艱辛。一旦攪到生意，他們便放下挑子，在街角鋪一塊帆布，立刻忙活起來，四周也會圍攏不少觀衆。看他們操作還真有意思：把破碗的碗口用細繩繫緊，雙膝上鋪一塊帆布，小心的將破碗口沿著接縫的兩邊鑿出隻隻小孔，再用一種小扒釘穿進小孔中敲牢，最後再抹上防水塗料，便完成任務了。張家李家，敲碎碗的碗還真不少，生意好的時候，工匠們常常幹一幹幾小時不歇手。

這個行當早經廢除。可是，由補碗時，工匠們用金剛鑽在瓷碗上鑽孔運作時，所發出的悅耳的，咕咕咕咕的聲音所演繹的歇後語，還不時從老南京們的嘴中蹦出來，抨擊只顧自己（吱）顧（吱）自（吱）。

歙縣·印象

魯人



青苔斑斑 上百年，數百年的老宅；白色的牆壁，青灰的瓦片，飛翹的屋簷，高聳的馬頭牆；院小牆高，一座老宅內三兩個幽靜小巧的庭院。徜徉於歙縣老街那些古舊民居中，不能不歎服徽派建築的精妙。緊湊的格局，從外觀頗有氣勢，從內看又頗為精緻，折行其間情趣盎然，並給人一種恰到好處的美感。做為古徽州府治的歙縣，擁有眾多各式的古舊民居，有世代官宦的府邸，有殷實富足的商賈住宅，有文人墨客的庭院，有普通百姓的祖居。老宅中都建有大小不一的天井。

雨天，水順著天井四周的廊簷傾瀉而下，匯於天井，名曰：聚財。想雨天懶懶地坐於廳堂，沏一壺香茗，聽雨水、雨絲、雨滴從簷上滑下叩擊石板的聲音，一定激越、清幽、悅耳。令人心身具靜。老宅的石灰牆不似當年那般雪白，被歲月沖刷出了一條條青蒼蒼的痕跡。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老宅中隨處可見的青苔。青苔在潮濕的牆基石和地磚上斑斑駁駁地發綠，從高牆的陰影裡透出一種濃潤，似一枝筆重重地抹上去的，充滿生機，又飽含滄桑，讓人見了心中悠悠地生出一股思古之情。

牌坊是傳統文化的一種表徵，它蘊含了太多歷史內容，有孝慈的溫馨，亦有人性的扭曲和禁錮。歙縣的牌坊是當地旅遊的重要景點之一，到歙縣不看牌坊，此行的意義至少失去了一半。據史料記載，歙縣先後共建過二百五十多座牌坊，如今仍保存有八十餘座，故素有「牌坊之鄉」的美譽。歙縣的牌坊尤以棠樾牌坊群最為著名，曾做過多部影視劇的外景地。棠樾牌坊群共七座相連，它記錄了當地旺族鮑氏家族多位祖先的事跡，建造的時間跨度為明清兩代數百年。

歙縣的牌坊散落於各處，古城的老宅旁；村落的民居間；鄉間的田野裡，年代久遠至元代。那些牌坊不僅為了旌表恪守封建禮教的貞節烈女，也有旌表在忠君、孝慈、樂善好施等各方面事跡突出的鄉紳名流。

品味歙縣的牌坊，總覺得它與古徽州文化有一種密不可分的淵源。徽州是新安理學的發祥地，新安理學不但對中國思想史產生過重大影響，對國人的社會道德觀也有著深遠的影響。而這一學派的奠基人程頤、程頤，及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均在徽州。新安理學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維，形成了當地仁厚慈愛的民風，建立了更鮮明的道德觀。而眾多的牌坊則是這一民風和道德觀的物象表徵。

筆墨氤香 歙硯、徽墨、字畫、木雕……擺滿了出售古玩的老店舖，這類店舖在歙縣老城隨處可見。

徽州古地，文風昌盛，並形成了強烈的徽派文化特色。歙縣縣城的主幹道兩側樹立了許多宣傳牌，每個牌上介紹了一位出生於歙縣的歷史人物，其中許多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人。中國畫壇極負盛名的揚州八怪有兩位出自古徽州，其中汪士慎就出生於歙縣。新安畫派的發源地為徽州，而新安畫派的現代後繼者黃賓虹大師，就出生於歙縣的練江之濱，隔江相望的則是中國現代教育家陶行知知的故里。

當地喜好書畫者頗眾。遊覽民居，客廳裡多懸有中堂，中間一幅畫，兩側一副對聯，全部是真跡，紙泛黃，顏色也暗淡了，看去總有百多年的歲月了。當地店舖子裡出售的歙硯，也是店主人自己雕刻的。

回津時，在火車上遇到一位古董商，專搞字畫。談起徽州的文化，盛讚當地文風濃郁，尤以小楷，更勝於其他地方。本地不諳明清，還是現代做造前人的字幅，都要比其他地方的見功力。他此次還是首行，卻一次買了數萬元的字畫，直至身上的銀行卡取空。